

北京文化史

顾 军 朱耀廷 主编



文苑英華

—— 古都北京的学术与教育

朱筱新 著

中 华 书 局

北京文化史

顾 军 朱耀廷 主编



文苑英華

—— 古都北京的学术与教育

朱筱新 著

中 华 书 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苑英华:古都北京的学术与教育/朱筱新著. —北京:中华书局,2016.1

(北京文化史)

ISBN 978-7-101-10639-8

I.文… II.朱… III.①学术思想-思想史-北京市②教育史-北京市 IV.①B2②G5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93092 号

书 名 文苑英华——古都北京的学术与教育

著 者 朱筱新

丛 书 名 北京文化史

丛书主编 顾 军 朱耀廷

责任编辑 杨春玲 林玉萍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三河市航远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16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8½ 插页 2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10639-8

定 价 42.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尊敬的朱耀廷教授(代序)

朱耀廷教授于2006年就开始策划北京文化史分类研究丛书的启动和项目申报工作,作为此丛书的第一任主编,在组织写作队伍、编订写作大纲、校订书稿等事务上耗费了大量心血。可惜天不假年,大厦倾颓,朱耀廷教授于2009年5月罹患癌症,2010年5月去世,在其生前此丛书只出版了两部,成为其终生遗憾。我辈作为朱耀廷教授事业上的后继者,继承其遗志,克服困难,坚持将此丛书全部编撰完成,并付梓面世,以此慰藉先生在天之灵。

朱耀廷教授生平

朱耀廷(1944—2010):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教授。196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史专业,国务院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北京文化史。主要社会兼职有北京市哲学社科规划办历史专家组成员,中国人才研究会常务理事等。主要作品有《成吉思汗传》、《元世祖忽必烈》等。

《北京文化史》丛书编委会

2013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北京地区学术教育发展的条件和原因	1
第二节 北京地区学术研究的特点	2
第三节 北京地区教育的特点	4
第二章 燕地学术与教育的产生	7
第一节 燕地学术与教育的始创	7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学术和教育	15
第三章 燕地学术和教育的发展	28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学术与教育	28
第二节 隋唐五代辽时期幽州的学术与教育	44
第四章 金代燕京的学术和教育	63
第一节 金代燕京学术发展的背景	63
第二节 金代燕京学术的发展与成就	69
第三节 金代燕京地区的学校和教育	82
第五章 元代燕京的学术与教育	91
第一节 元代燕京地区学术文化和教育发展的背景	91

第二节 元大都的学术和成就	101
第三节 元大都的学校教育	132
第六章 明朝北京的学术与教育	149
第一节 北京地区学术文化发展的背景	149
第二节 北京的学术成就	159
第三节 北京的学校和教育	175
第七章 清朝前期北京的学术和教育	187
第一节 社会的变化与学术文化发展的背景	187
第二节 北京的学术成就	201
第三节 北京的学校和教育	225
第八章 清朝后期北京的学术与教育	250
第一节 社会的巨变与学术文化的发展	250
第二节 北京地区的学术成就	256
第三节 清朝后期北京的学校与教育	272
后 记	289

第一章 绪论

北京地区学术与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曲折的历程。今天,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北京不仅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更是全国的学术和教育中心。事实上,这一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就已经确立。不过,北京地区成为全国学术与教育中心地位的形成,既有其深远的历史根源,也有其特定的社会背景与条件。

第一节 北京地区学术教育发展的条件和原因

位于华北平原北部的北京地区,由于地处平原与燕山山脉的相交地带,其西、北二面凭倚燕山,东、南两面毗邻华北平原。而历史上,横亘华北平原北部的燕山山脉以北地区,长期生活着游牧民族,以南则生活着农耕民族。北京所处的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正处于中国古代的农耕文明与畜牧文明的交汇之处。南北两种不同特征的文化通过北京地区这条通道传向对方,因此北京地区很早便成为北方草原文化与中原内地文化交流的必经之地,并直接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正是这种不同文化间的相互交流,也为北京地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外部条件。使历史上的北京地区学术教育打破封闭的状态,形成了开放的、兼容并蓄的特点。

这一地理上的特殊位置,也使北京地区很早就成为中原北边的重镇。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中原地区的政权常将这里作为防御北方民族南下的重要屏

障,而入主中原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则将这里作为他们统治中原及内地的中心据点。因此,这里聚居着大量的人口,其中不乏为数众多的文人学者。特别是辽将燕京作为南京,金朝海陵王又将燕京升为中都,从而开始了北京作为都城的历史。燕京城地位的改变,更使燕京地区成为北方各地文人才子向往的地方。通过各种途径和渠道,大批来自各地的人才云集于此,极大地提高了北京地区的学术文化水平,也进一步促进了地区学校教育的发展。此后,元、明、清三朝都相继定都在这里,不仅确立和巩固了北京地区作为国都的地位,还因元朝以后都是统一全国的政权,云集于北京地区的文人学者更是各地出类拔萃的人才,从而更极大地提升了北京地区的学术文化地位和水平,巩固了北京地区学术文化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除地理、地位等原因外,北京地区学术文化和教育的发展,还与各朝代的选官制度及方式,特别是与隋朝建立的科举制度有直接的关系。虽然,据文献资料记载,北京地区最早的学校出现于先秦时期,但严格地讲,其真正发展,则是在科举制度产生以后。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社会选拔人才的重要途径,为生活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文人学者提供了入仕为官的机会。这种通过考试的选官方式,使社会认识到只有读书才能够具备入仕的基本条件,因此以学校为主要形式的教育得到迅速的发展。尤其是在金朝以后,作为国都的北京,不仅建立了中央、地方三级学校体系,还开办了各种科目的学校,学校的规模亦迅速扩大。学校的管理、相关的制度等方面,也随之更加完善。

在这些外部条件和原因的作用下,历史上的北京地区很早就形成了重视文化和教育的社会传统。正是有了这种社会传统,北京地区的学术和教育才能持久地发展和兴盛。

第二节 北京地区学术研究的特点

历史上北京地区的学术研究由于受社会背景、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

首先,北京地区的学术成就与地理位置、环境、社会的发展和形势的变化,有必然的联系。这不仅反映出地区学术研究与社会内在联系,更表明学术

的研究具有针对性、现实性和实用性的特点。

如战国时期,在七雄纷争的局势影响下,特别是当秦国强盛、对关东六国构成严重威胁之时,燕地便产生了以纵横学说为代表的学术派别,成为诸子百家之一,在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占有重要的一席。

其次,由于北京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也使其在继承中原地区传统文化的同时,较多地吸收了北方民族的文化,故而打破封闭的格局,形成开放的、兼容并蓄的特点。这一特点也极大地促进了地区学术的活跃和发展。在各个历史时期,北京地区的学术研究及其成就,都表现出传承、开拓、创新的特点。

如自汉代以来,经学、哲学一直是燕地学术的主要流派。魏晋南北朝时期,幽州地区的经学、哲学研究不但依旧活跃,继续取得较多的成就,而且成果所涉及的范围及深度均超过前代。同时,史学与佛学等领域的研究也异军突起,并取得显著的成就。在以后的朝代中,由于北京地位的改变,燕地的学术更加活跃和兴盛。特别是在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统治时期推行的“汉法”政策影响下,燕地在儒学、史学等方面的学术研究取得极重要的成就,不但沿袭了内地传统的学术成果,而且在“广纳百川”的开放、兼容传统作用下,不断拓展学术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再则,北京地区的学术研究还善于借鉴和吸收外来的先进学术思想、方法和成果,并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及研究成果相结合,由此而产生新的学术思想,同时也推进了学术研究的不断创新和深化。

自16世纪开始,欧洲的一些传教士陆续来华,进入北京,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知识。因此这一时期北京地区的学术文化十分活跃,不仅在传统的儒学(理学)、史学、文学等方面取得了重要的学术研究成果,还进一步推进学术研究向纵深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学术水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反传统儒学思想和学说的出现,从而将中国古代传统的辩证、唯物论学说,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更为古代哲学的继续发展,特别是早期启蒙思想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进入近代以后,又兴起经世实学的学术思潮,产生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思想家。

即使在封建专制统治的极盛期,受专制和禁锢的影响,北京地区的学术气氛虽然一度陷入沉闷,但在学术研究上依然成果斐然。以考据学为代表的学

术活动,在北京地区仍十分活跃,在史学理论、史籍整理与编纂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正是基于学术研究的活跃和不断发展、开拓和创新,历史上的北京地区,在学术研究中不断产生新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学术水平亦随之提高,从而奠定了地区学术研究的基础,并逐步提升了其在全国学术研究中的地位。而当北京开始都城的历史后,又最终确立了全国学术研究的领先地位。

第三节 北京地区教育的特点

自古代至近代,北京地区的学校教育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历程。在这个发展历程中,北京地区的教育出现了一些特点,这些特点也是北京地区教育持续发展的基础。

首先,古代北京地区的教育格局比较完整,具备了较为完善的教育体系。

自西周开始,燕地便出现了最早的学校——官学。春秋以后,随着政局的变化,私学亦出现在燕地。西汉武帝至平帝时期,在中央政权的统一部署下,燕地始建郡、县、乡三级学校,开始形成基本覆盖全地区的教育网络。此后尽管时局多变,学校时建时废,但这种格局基本得以维持。

自金朝定都燕京后,北京地区的教育格局更加完善。从中央的国子监、太学到府、州、县学,官学形成四级建制。不仅如此,自开始都城的历史后,北京地区还先后建立了武学、医学、算学、钦天监、四夷馆,以及宗学、回回学、八旗官学等学校,负责培养各种专门人才和贵族子弟。

更为重要的是,清朝前期北京地区还在最基层的乡镇设立社学,以及城里设置的专招市民子弟的义学等,这也使得清朝前期的学校更加普及,为更多的普通民众子弟提供了上学和受教育的机会,进一步促进了北京地区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为此后北京地区学术文化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二,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家学占有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北京地区的家学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据文献资料分析,北京地区在历史上的家学应出现于汉代。如东汉时期在学术上取得极其显赫成就的崔骃、

崔瑗、崔寔祖孙三人,就反映了这一时期燕地家学的存在。这一事实还说明,在这一时期燕地的家学不仅兴盛,而且具有极高的学术水平。又有时称“海内大儒”的东汉著名学者卢植,在师从名儒马融、博通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后,曾辞归乡里,闭门传授弟子。他教育和培养了不少后来的名士,如刘备、公孙瓒、高诱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幽州地区的家学十分盛行,尤以世家大族最为兴盛。卢氏家学便是其中的代表之一。从魏晋开始,卢氏门第渐崇,“世以儒业显”的家风渐立。在以“经学传世”为宗旨的家学教育下,卢氏子孙世代相习相承,传承着卢氏家族的文化和学术。

除范阳卢氏家学外,在幽州地区的其他世家大族亦多通过家学的方式,向子弟传授知识。北平无终阳氏家族、范阳祖氏家族等,也多有家学。所以其后代子孙的学术成就多具有家族传承的特点。

其三,私学也是北京古代历史时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京历史上的私学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到三国两晋时期,幽州地区的私学开始盛行。许多文人学者在成名或辞官还乡后,聚众讲授,开设私学。北魏以后,幽州地区更是学者云集,私学也更加兴盛。由于这一时期幽州地区的学术文化及水平已为世人所称颂,故常有外地文士到此求学。此后,私学也成为北京地区教育的一种传统形式,一直延续下来。

作为中国古代学校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书院,也在元朝时期出现于大都地区。虽然在历史上,北京地区的书院数量有限,规模也有限,但它的出现,不仅扩大了教育的范围,培养了一批专门的学术人才,也是对学校教育的补充,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

其四,学校教育与社会发展联系紧密。

清朝后期,科举制度的痼疾日渐加剧,导致其最终走向衰亡。与此相适应的传统学校,也因此步入衰微的境地。在变法维新派“兴学、育才、强国”思潮的推动下,以学习西方语言文字为主的新式学堂最早出现在北京地区。此后,仿照西方建立的近代新式学堂,也陆续在北京城内建立。这些学校无论是管理制度、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都与传统学校截然不同。这对于推进北京地区社会文化和学术的持续发展,无疑也注入了新的活力。

由此可见,北京地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学术活动和取得的成果,既基于本土文化的发展,又吸收和借鉴了来自全国各地及西方的文化;同时又因这一地区在中国社会历史上地位的改变,形成了人才荟萃的优势;加之北京地区各种形式的教育,发挥了培养人才的积极作用,也形成了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社会风尚。这对北京地区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及近代历史上能够较早成为并一直保持着全国文化和学术研究中心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原因和条件。

第二章 燕地学术与教育的产生

北京地区的文化源远流长。自从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出原始人类,便随之产生了原始的文化。其后,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特别是人类社会逐步走向文明,逐渐形成了具有地域性特征的文化。同时,由于北京地区所处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既毗邻中原地区,又处在历史上的农耕文明区和游牧文明区的交汇处,在与各地区和各种文化的交流中,其地域性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形成了多元化的特征,极大地丰富了本地区文化的内容和内涵,亦为燕地文化的兴起,及以文化为基础的学术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一节 燕地学术与教育的始创

一、燕地学术的初现

燕地的学术,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它的出现,与这一时期的时局变化有直接的关系。

自周平王东迁后,东周开始出现王室衰微、诸侯强大的局面。此后,中原地区的诸侯凭借着强大的实力,开始称霸。中原地区逐渐陷入战乱之中。不过,由于燕国距中原较远,且实力不及“五霸”强盛,因此极少卷入战乱之中,其社会相对比较稳定。

春秋时期,随着以铁器、牛耕技术为代表的农业生产力的进步,土地私有

产生,形成了新兴的地主阶级。各诸侯国相继推行的赋税制度的改革,逐渐确立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处于这个社会大变革时期的社会思想文化领域十分活跃,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但此时,北方戎狄势力强盛,不断侵扰燕国,掠夺财物和人口,给燕国造成极大的威胁,也给燕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严重的破坏。加之燕地地处与北方民族杂居之地,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新兴的地主阶级实力亦相对较弱,故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制约着燕地文化的发展和学术思想的活跃。因此在这一时期,燕地尚未形成诸如中原那样浓郁的文化氛围,学术领域内亦不十分活跃。

进入战国以后,这种局面逐步得到改变。战国初年,经过长期的兼并战争,七国并雄的局面逐渐形成。地处最北的燕国在争战中,亦扩大了它的势力范围:“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呼沱、易水。”^①受中原地区已建立的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燕国也开始了向封建社会的转化。不过,在群雄纷争、相互兼并的局势下,燕国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实际仍是一个实力相对较弱的诸侯国。为了能在群雄并立的局面中保存自己的实力,确立自己的地位,避免战火的侵扰,以求进一步壮大,燕国君主最早接受了纵横家的学说。而将纵横家学说传入燕地的是苏秦,以及苏代、苏厉等人。

纵横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一。据宋人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卷十一“纵横家类”中考证,其创始人不详,因其“战国时隐居颍川阳城之鬼谷,因以自号。长于养性治身,苏秦、张仪师之。叙谓此书即授之二子者,言捭阖之术,凡十三章。《本经》、《持枢》、《中经》三篇”。这一学派虽不及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对后世影响之大,但在战国时期学习纵横家学说的,多为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为了推行合纵或连横的策略,他们游说于诸国,用纵横家的学说,诠释外交策略,对当时的政局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一学派能在燕地备受重视,并以燕地为“基地”,得以传播到关东六国,不仅在于苏秦等纵横家们的辩才,也在于这一学派适应了当时的社会形势。

苏秦(?—前284),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早年曾就学于纵横家

^①何建章《战国策注释》卷二十九《燕策一·苏秦将为从北说燕文侯章》,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81页。

鬼谷先生，“释本而事口舌”^①。燕文侯时，苏秦入游燕国，并向燕王讲述纵横家学说。但他并非简单地介绍纵横之术，而是将纵横家的学说运用于治国之术。在分析七雄并霸的局势及燕国的应对措施时，苏秦指出：“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也。秦赵五战，秦再胜而赵三胜。秦赵相毙，而王以全燕制其后，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赵之攻燕也，发号出令，不至十日而数十万之军军于东垣矣。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战于千里之外；赵之攻燕也，战于百里之内。夫不忧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计无过于此者。是故愿大王与赵从亲，天下为一，则燕国必无患矣。”^②

苏秦的分析，切中燕国的利益所在。在燕国周围，除相邻最近的赵国外，齐国亦相距不远，因此燕文侯采纳苏秦的纵横家学说，将其运用于与邻国的交往和关系上：“子言则可，然吾国小，西迫强赵，南近齐，齐、赵强国也。子必欲合从（纵）以安燕，寡人请以国从。”^③并“资苏秦车马金帛以至赵”^④。燕文侯的这一做法，实际确立了纵横家学说在战国时期的社会政治和学术地位。这一学说被应用于处理与燕国邻近各诸侯国的关系上，由此产生了“合纵”的策略及学说。这一策略随着苏秦奉燕文侯之命，游说于赵、齐、楚等国，亦被这些诸侯国的国君们所采纳和接受，其学说在战国百家争鸣的局面中，因此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当时，东方的齐国和西方的秦国在七雄中最为强大。齐国距燕国较近，因此燕国采取的合纵策略，首先是对付齐国。苏秦奉命赴齐国，意在挑拨、离间齐国与其邻国宋、赵两国的关系，设法制造摩擦，然后利用这些诸侯国与齐国的矛盾，钳制和削弱齐国的实力，以便燕国趁机出兵攻齐。苏秦在游说赵、齐、楚等国国君时，充分利用纵横家极擅诡辩的口才，将纵横家创始人鬼谷子的以黄老“心术”论世御事、讲求内外损益之理，进而崇尚“反应”、“揣摩”、“捭阖”之

①《史记》卷六十九《苏秦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41页。

②《史记》卷六十九《苏秦传》，第2244页。

③《史记》卷六十九《苏秦传》，第2244页。

④《史记》卷六十九《苏秦传》，第2245页。

术,发挥得淋漓尽致。

正是因为战国七雄中,燕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国势均不占优势,燕国的国君们要在列强并立的形势下存在和发展下去,一方面需要通过发展生产和经济,使国力强盛;另一方面则需要尽可能协调与其他诸侯国的关系,避免构成对自身统治的威胁,又要寻找可能借助的力量,实现其称雄的目标。而纵横家的学说,能较好地解决这对矛盾。通过“合纵”,在结好近邻的基础上,为自己创造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苏秦死后,“苏秦之弟曰代,代弟苏厉,见兄遂,亦皆学”^①,也成为纵横家。后他们亦入燕求见燕王,提出合纵楚、魏两国为援,共制齐、秦的主张。燕王遂又命其游说相关诸侯国,以达制齐、秦两国的目的。经过苏秦、苏代、苏厉三位游士的传播,纵横家学说在燕地颇具影响,这也为燕地学术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在传播过程中,因其观点和主张适应诸侯国割据的需要,又很快便被各国诸侯所采纳,最终成为春秋战国舞台上一个重要的学术派别。

为了在列强激烈的争战中得以生存和发展,燕国的国君继中原各国及秦国变法之后,亦开始推行变法。但因为燕国不利的地理位置,人才匮乏,所以招贤纳士便成为燕国变法的核心和关键所在。

还在燕王哙在位时,就曾发生过“禅让”的事件。“苦身以忧民”、“勤身而忧世”^②的燕王哙,为了强盛燕国、改革政治而求贤心切,竟将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并将俸禄三百石以上官吏之印全部收回,交由子之重新任命。尽管这出闹剧一度导致燕国内乱,其他诸侯国则趁机出兵干涉,险些使燕国灭亡,但亦可看出,进入战国以后,燕国国君已开始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想方设法地招揽和使用利于“图治求强”的各方面的人才。

在内乱中即位的燕昭王,更清楚人才的重要性,不惜卑身厚币以招贤纳士。他曾令大臣郭隗广为物色人才,并告之:“齐因孤国之乱,而袭破燕。孤极知燕小力少,不足以报。然得贤士与共和国,以雪先王之耻,孤之愿也。敢

①《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266页。

②《韩非子·说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25页。

问以国报仇者奈何？”郭隗则提出：“今王诚欲致士，先从隗始。隗且见事，况贤于隗者乎？岂远千里哉？”从燕国君臣的这段交谈中可以看出，“招贤若渴”的燕昭王是将人才与强国、雪仇联系在一起，所以他才能“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并能“与百姓同其甘苦”。燕昭王的招贤确实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许多著名的贤士纷纷应召入燕，“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凑燕”^①。

众多的贤士云集燕国，一方面为燕国的强盛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燕国文化的发展，促进燕地学术的产生。这些来自中原其他诸侯国的贤士们，有的就是当时内地流传的学术思想的代表人物。就是他们将这些学术思想和成就带到燕地。所以，燕地学术的兴起，也是“招贤”的必然结果。

继纵横家学说之后，传入燕地的学术思想主要是阴阳家。

在应召入燕的贤士中，邹衍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战国中晚期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前 306—前 240），齐国人。他“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他采用“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的方法，创立了“闢大不经”学说。他认为，“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 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在治国的问题上，他指出，“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②。

邹衍认为历史是按照五行的原理循环发展的，每一个时代受五行中的某

①《战国策注释》卷二十九《燕策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章》，中华书局，1990 年版，第 1110 页。

②《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中华书局，1959 年版，第 2344 页。